

历史
琼崖



海瑞墓：滨涯有幸存忠骨

■ 金满楼

位于海口市丘海大道39号的海瑞墓园，不仅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时也是海口乃至整个海南的一张文化名片。海瑞墓始建于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是万历皇帝亲自点派海瑞的学生兼同乡许子伟专程到海南监督修建的。悠悠400多年，海瑞墓经历了无数的历史风雨，但一直被他的家乡人很好地保护着。目前，经过几年改造的海瑞墓园修葺一新，正门石碑坊上的阴刻丹红大字“粤东正气”，在海南强烈的阳光里熠熠生辉。

海瑞死后遗物不足以治丧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著名的“青天”，一个是宋朝包拯“包青天”，另一个就是明朝海瑞“海青天”。海瑞，字汝贤，号刚峰，海南琼山人。他生于明朝正德九年（1514年），早年丧父，由母亲谢氏独力抚养成人。嘉庆二十八年（1549年），海瑞乡试中举，后经两次会试未中而被派为福建南平县教谕。不久，又先后出任浙江淳安、江西兴国知县。任内，海瑞清丈田亩，均平徭役，平反冤狱，廉洁自持，深得百姓拥戴。

嘉靖四十五年（1564年），海瑞升任户部云南司事，入朝为官。当时，嘉靖皇帝急于朝政，宠信方士，妄求长生不死之药，而朝廷上下，个个装聋作哑。海瑞到京不久，即犯言直谏，他一面自备棺木，一面上奏《治安疏》，结果被罢官入狱，朝野为之震惊。嘉靖皇帝驾崩后，海瑞官复原职，随后又出任应天巡抚。在此期间，海瑞力除旧弊，并主持疏通吴淞江与白茆河，但也因为打击地方豪强而遭到权贵的侧目。不久，海瑞即遭奸佞排挤而被罢官回乡闲居16年之久。

万历初年，张居正秉持朝政，他并不喜欢海瑞的峻刻，后者也就无意以申。直到万历十二年（1584年）张居正去世后，海瑞才被重新起用，但此时他已经年过七十了。万历十五年（1587年）十月，海瑞病故于南京任上，年七十三岁。

事后，因为海瑞无子，南京金都御史王用汲代为主持丧事。他到海瑞住处一看，只见隨身破竹箱一只，里面仅俸银十余两，一条葛巾，数件旧袍，别无所有。所谓“葛巾蔽簪，有寒士所不堪者”，此情此景，清官之清，让王用汲大为震动而抑制不住泪如雨下。

由于海瑞死后别无长物，所遗之物也根本不足以治丧（连棺材都置办不起），王用汲感动之余，最后和同僚、同乡等一起凑钱才把丧事办好。海公死讯传出后，南京百姓十分哀痛。出殡当天，南京城内万人空巷，商者罢市，农者辍耕，都来送“海青天”最后一程。海瑞灵柩从南京由水路运返海南时，据《明史》中记载：“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爵而哭者，百里不绝”。事后，明廷赐祭八坛，赠太子少保，谥号“忠介”。



海瑞画像。（资料图）



海瑞墓石碑坊，“粤东正气”4个红色大字熠熠生辉。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高空航拍海瑞墓修缮及改扩建项目。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皇帝钦点许子伟修建海瑞墓

由于海瑞的老家在海南，其灵柩出长江后，又经海路运回原籍。据说，当灵柩经过滨涯村时，抬棺的绳子突然断裂，人们认为这是死者自己选定的墓地，于是就在这里给海瑞建起了墓园。当然，这一传说未必经得起推敲，但这种死后显灵的故事容易被民众所接受，所以流传颇广，姑妄听之吧。

事实上，海瑞墓是万历皇帝亲自点派专人前去修建，而钦点之人不是别人，正是海瑞的学生兼同乡许子伟。许子伟同为海南琼山人，年十四而丧父，经历和海瑞类似。早年，许子伟刻苦求学，孜孜不倦。十五岁那年，海瑞被罢官回籍，许子伟登门拜师，师生二人志趣相投，一时为忘年之交。在海瑞的影响下，许子伟后来先后考中举人和进

士，在京为官。

和民间传说不同的是，许子伟受命为恩师建墓的任务后，他一路扶灵，跋涉万里鲸波，最终抵达琼山县。在灵柩暂厝于明昌塔期间，许子伟为给老师选择一个合适的安葬之地而考察了很多地方，最终才选中了琼山西郊滨涯村。

万历十七年（1589年），在许子伟的一手经营下，海瑞墓最终修建完成。从规制上看，海瑞墓是一座典型的明代高级官员墓葬。墓园坐北朝南，正门外立有圆形石柱华表一对，门口立有一块肃穆的石牌坊，坊额上刻着“粤东正气”四个大字。牌坊的后面是笔直的墓道，墓道两侧有石羊、石马、石狮子、石龟和石翁仲。海瑞墓家位于墓道的尽头，外形如钟，由花岗岩砌出。墓家南侧，立有一块高约三米的石碑，上书“皇明敕葬资善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赠太子少保谥忠介海公之墓”，右题“钦差督造坟茔兼斋谕祭文行人司行人

红色报刊中的历史细节

■ 孙雯

各个历史时期，红色革命报刊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新青年》《湘江评论》《布尔塞维克》……革命党人克服重重困难创办革命报刊、传播真理之火的光辉历程，深刻展示了革命前辈不畏艰辛、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而红色革命报刊中的历史细节，不但映照出了其创办人或负责人的风采，也真实见证了革命之路的成功与挫折。

《新青年》《每周评论》并肩作战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月刊），1916年更名为《新青年》。《新青年》创办时，陈独秀主张思想革命，反对封建主义，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后来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陈独秀、李大钊深入了解俄国革命的情况和经验，研读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新青年》才开始向社会主义转变，并一度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

在经历了陈独秀被捕、几度中途休刊和编辑部迁移后，1922年7月1日，《新青年》出至第9卷第6号休刊，共出版9卷54期。《新青年》第一篇纲领性的文章，即发表在第1卷第1号的发刊词《敬告青年》。文中向青年提出了六项希望：“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鲁迅在五四时期的主要著作绝大部分也是在《新青年》上发表的。

与《新青年》同一时期“并肩作战”的还有陈独秀、李大钊创办的周刊《每周评论》。1918年12月22日，《每周评论》在北京创刊，陈独秀为书记及编辑，李大钊、高一涵、高承元、张申府、周作人等人为撰述。在发刊词中，陈独秀指出，《每周评论》的宗旨，也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八个大字。《每周评论》以及时反映当前迫切的政治问题为主，与《新青年》侧重理论的特点互为补充，在当时同样具有很大的影响，它们共同为五四运动作了重要思想准备。

毛泽东代笔大半《湘江评论》

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思想界空前活跃，涌现出了一大批进步报刊，据统计约有四百多种。李大钊曾兴奋地描述：“（它们）好像花草的种子，被风吹散在遍地。”（《新青年》第6卷第6号《欢迎陈独秀出狱》）这些“种子”就包括了毛泽东主编的周刊《湘江评论》。

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在《创刊宣言》中，毛泽东写道：“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激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如何施行它？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要的大任务。”由此可见，“宣传新思潮”是《湘江评论》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借以“唤起民众之觉悟”的方法。在《创刊宣言》中，毛泽东鲜明地写道：“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除《创刊宣言》，毛泽东还主笔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好个民族自决》《民众大联合》等几十篇文章，明快的文风和精深的议论，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受到了李大钊等人的高度重视和评价。除社论外，《湘江评论》辟有多个专栏，对国内外大事皆有述评，还有栏目经常回答读者提出的问题，与读者互动十分密切。北京的《每周评论》专门对此予以介绍：《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以及“武人统治之下，能产出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湘江评论》创刊时的2000份很快销售一空，又重印2000份，依然不能满足需要，从第二期起每期便印5000份。充满了“反叛”精神的《湘江评论》很快引起了湖南军阀的恐慌，只短暂存在了5期便被查封（第5期刚被印出尚未出版时被查封），但它对华南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许多革命青年，如萧劲光、任弼时、邓颖超等人，都是在读了《湘江评论》后，才坚定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不断“变脸”的《布尔塞维克》

1927年10月24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秘密创办《布尔塞维克》，这是中共中央在大革命失败后创办的理论性机关刊物，最初由瞿秋白担任总编，前16期为周刊，铅印16开本，第17期开始改为半月刊，后又改为月刊、双月刊出版。

在白色恐怖的危险笼罩下，《布尔塞维克》从第30期后开始以各种假名称作为伪装出版，“曾用名”可谓五花八门。

1929年1月，《布尔塞维克》以《少女怀春》为名出版了第31期，随后用《中央半月刊》出版了32至34期，第35期改为32开本，用《新时代国语教科书》（印有“小学校高级用”“商务印书馆”字样）刊行。直到1932年7月1日停刊，《布尔塞维克》共出版52期，在大革命失败的危急关头，坚定地传达出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声音。

（据《北京晚报》，有删节。）



投稿邮箱 hnrbyfb@sina.com

秦陵一号铜马车

秦陵彩绘铜马车一组两乘，1980年出土于秦陵封土西侧20米处车马坑中，现陈列于秦俑博物馆文物陈列厅内。

铜马车是秦始皇的陪葬品之一，象征着秦始皇驾乘的一部分。铜马车的形制是模仿真车的形状。

《后汉书·舆服志》刘昭注引徐广曰：“立乘日高车，坐乘日安车。”可见一号车应该是秦始皇乘舆中的立车，又名高车。一号车虽然有伞但四周敞露，又配有兵器，实质上应该是兵车。蔡邕在《独断》中记述秦始皇法驾卤簿的车马仪仗时曾说：“又有戎立车以征伐”，说明了立车在皇帝车队中用以开道、警卫和征伐的作用。

秦陵一号铜马车是古代单辕双轮车，按照秦代真人车马1/2的比例制作。铜马车整体用青铜铸造，大量使用的金银饰件重量超过14千克，零部件达3000余个，采用了铸造、镶嵌、焊接、子母扣连接、活铰连接等多种工艺组装而成，是我国考古史上截至目前出土的体型最大、结构最复杂、系驾关系最完整古代车马，被誉为“青铜之冠”。

铜车马通体施以彩绘，有云纹、几何纹、夔龙纹等图案，红、绿、紫、蓝等色彩艳丽丰富，生动描绘了秦代皇家属车的华贵富丽。秦陵彩绘铜车马是秦代宫廷舆服制度的真实写照，对研究古代车制更是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杨道 辑）

古代也有暑假

■ 王淑芹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再过一个月，又是一年暑假了。你知道古代学生是怎样放假的吗？

这里的古代学生是指国子监的学生，国子监是隋朝以后古代中央政府建立起来的官学，是封建社会建立起来的最高学府。明清时期，在国子监读书的学生称为监生。明朝时期，北京和南京分别设有国子监。南京的称为南监，北京的称为北监。

据史料记载，早在汉武帝时期，从官方创立太学开始，就有了太学生的休假制度，主要是“田假”和“授衣假”，相当于现在的暑假和寒假。一直到隋唐时代，才确立国子学（即太学，又称国子监）假期制度。国子学是隋朝中央政府建立起来的最高学府。据史料记载，当时有三种假期：第一种是“旬假”，十天为一旬，

每旬只放一天假，不允许外地的学生回家；第二种是“田假”，每年农历五月份开始放假，时间一个月左右，出身农家的子弟可以回家帮忙干农活；第三种是“授衣假”，是每年农历九月份天气渐渐变冷以后，让学生回家取衣服的假，时间也是一个月左右（往返路上的时间不算天数）。唐朝对假期有严格的制度：凡逾期不返校者将被开除，但是路途太遥远的可以适当申请延长假期。《新唐书·选举制》上有明确记载：“每年五月有田假，九月有授衣假。”

其实，国子监的学生也经常放假，有旬假、田假、授衣假等。旬假是指一个月每旬放假一天，即十天放假一天，供学生们休息；田假则是专门为农忙时期而放的假，此时出身于农家的学生都会赶回家里帮忙；授衣假起始于唐朝时期，意为

九月天气变冷的时候，专门放假让学生回家准备过冬的衣服。一般而言，田假和九月的授衣假假期都比较长，时间有一个月。

《新唐书·选举志》上：“每岁五月有田假，九月有授衣假。”《诗经》里也有“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的记载。九月之所以成为授衣假，一是因为这个时候开始霜降，天气变冷。二是因为妇女们开始闲下来了。

田假和授衣假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暑假和寒假吧，两者加起来的假期也有两个多月。古时的国子监因为设在京城首府，国子监的监生都是从全国各地选拔而来，有的路途很近，有的却很遥远。为了方便学生回家，这样的假期一般都比较长。更为人性化和可取的是，这一个月的假期是不包括学生来回奔波的时间的。

唐朝时期的旬假一般是在旬考后的第一天放假，田假和授衣假基本上是在五月和九月。如果有一些学生实在因回家的路途太遥远而耽搁了过多的时间，可以申请适当延长假期。当然，唐朝对学生的假期管理制度也有严厉的一面，如果学生申请了适当延长的假期而没有按时返校，则予以辞退处理。

相比而言，明朝的太学生待遇十分优厚，每月不仅可以补贴六斗米，还能获得鱼肉等奖励，甚至每月还可以领取一些俸禄。虽然在物质上十分优厚，但学生要穿御定的学生服，如果想回家得皇帝批准才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明朝的学生生活是很不自由的。

在科举制度高压之下，古代学生的寒暑假生活相比于今天，应该单调枯燥许多。